



龚刚 著

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

南开大学出版社



龚刚 著

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 / 龚刚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310-04683-6

I. ①钱… II. ①龚… III. ①钱锺书(1910~1998)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89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2 插页 236 千字

定价:4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言

乐 黛 云

21 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

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

本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钱锺书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考察他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1990年，因为电视剧《围城》的热播，众多中国观众发现了深藏身与名的钱锺书先生，由此衍生了“《围城》热”、“钱锺书热”，这股追踪、探究作家钱锺书与学者钱锺书的热潮，迄今没有消退，可见艺术的魅力与人文精神的感召力。

《围城》这部小说的诙谐机智，以及弥漫其中的文人味和没落贵族的气息，使它特立于当时的小说界，令我有一种不期然的惊喜。在这部小说的前半程叙事中，我隐约看到一个站在人生边上、对浮世众生评头品足、且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钱锺书；到了后几章节，我看到的是一个“忧世伤生”的钱锺书，并感受到一种直透肺腑的悲凉之气。全书终局部分——也就是关于方孙婚姻破裂的叙事，因人生哀感压倒了炫智炫博的冲动，文笔愈趋纯净，刻薄味也趋于寡淡，实为全书精华。同样讽刺文化人和表现婚姻困局的短篇小说《猫》放大了就是一部《围城》，而布局考究、叙事流丽的《纪念》在小说艺术上并不亚于《围城》。

钱锺书和她的夫人杨绛都是亦学者亦作家的世间一流人物。杨绛的散文写得干净而有情味，非常动人，钱锺书的散文（以《写在人生边上》为代表）虽极见才智谐趣，似未臻自然而妙之境。以小说而论，杨绛的《洗澡》类乎《围城》，亦是状写文人之颠沛与情爱，但其烛照人性的洞察力和

书写人情世态的笔力，则略逊于《围城》。小说和散文写作原是一副笔墨，非冷眼静观，不足以言小说，非人情深蕴，不足以言散文。《红楼梦》诚然是曹雪芹之哭，但他若只是记情、写情，而没有对世态人情的静观、洞悉，也就写不出这部超一流的人情小说。

钱锺书亦是旧诗名家。钱诗风格有前后期之别，近代诗评宗匠陈石遗先生病其少作好为李义山、黄仲则辈风华绮丽之体，劝其多读宋诗。钱锺书后期诗作确乎近宋不近唐，“用字，声、律很讲究”（杨绛语），且以才学和智性见长。他的旧诗写作经验对他的诗学研究很有助益，因有“同情之了解”（陈寅恪语），故往往能洞幽烛微。我藏有《中书君诗初刊》一册，《槐聚诗存》一册，两相对照，足见诗艺流变之几。

因钱锺书与陈石遗渊源颇深（记录老少二位月旦近世文人的《石语》即是明证），而陈石遗是“宋诗派”领军人物，故郑振铎先生以为钱锺书喜欢宋诗，遂嘱其著《宋诗选注》，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分册。钱锺书自谓《宋诗选注》因“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足见其襟怀。该选本的精彩处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在于小传和注释。钱锺书以小说笔法，勾画出一帧帧风趣传神的诗人小像，注释中则每有匠心独运之洞见，颇能启人灵思。近人之各类诗词选本甚夥，有考据精审者，有选诗眼光高超者，但以文字趣味而论，罕有其匹。盖因钱氏深得“能作”“能评”、“善写”“善鉴”互洽之旨，于手操选政之际，能以己之创作心得化入诗评，且出之以小说笔意。

《选注》序言亦堪称妙文。该序言对宋人备受异邦欺压的苦况、宋诗深受唐诗压迫的苦况、宋诗的特点与缺陷及其选诗标准（也即著名的四不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作了俏皮评说。其所状写之诗人，读来如小说角色；其所

描述之诗艺流变，读来如小说情节。若谓钱氏小说乃学人小说，则此类文字可说是小说化的文评。该序言全文长达三十余页，乃钱氏诗学观之一大结穴处。法人编辑逖译之钱锺书《诗学五论》将其收录其中，与《谈艺录》第一则（谈“诗分唐宋”）及《七缀集》中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诗可以怨》并列。此选集似可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相颉颃。

在钱锺书的所有中文著述中，《谈艺录》和《管锥编》无疑是最厚重的两部。《谈艺录》旨在谈艺衡文，主题相对集中。《管锥编》则有熔文史哲于一炉之势，颇似顾炎武的《日知录》，且成书时亦采用了以重视一手材料之收集与别择为特征的“纂辑”之法，只不过，钱氏“纂辑”所及的范围比顾氏更广，且以探究诗艺、抉发文心为内核。《管锥编》内容庞杂，征引繁富，各片断之间基本不相连属，所涉语言达七种之多。有人以“在七度空间逍遥”（黄国彬语）形容钱氏著书时广引英、法、德、意、西各语种文献的潇洒，颇为形象。《管锥编》非体系化论著，且有打通文史哲之势，所牵涉话题繁若星辰，且每谈一话题，往往广征博引，出东入西，也时有灵光一闪的洞见，可以说是类书和智慧书之合体。

从《谈艺录》和《管锥编》可见，钱锺书确乎比较偏爱传统学术范式，但他也并非不擅长西式论文的撰著。一册《七缀集》及包括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在内的多篇英文论文（见《钱锺书英文文集》），即是明证。钱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负笈英法，深受西方学术熏陶，对近代西式论文格式也操练甚熟。值得一提的是，《七缀集》中的七篇学术专论，有半数以上在开篇处或结局处，都有方法论性质的大段陈辞。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开头，几乎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说明文艺风气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结尾，揭示了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的脱节；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的开头，则论述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个人

趣味的对立。此外，在《谈艺录》、《管锥编》中，也散布着大量的方法论言述。可见钱锺书是一个方法论意识很强的学者，这在“方法论贫困”的学术氛围里相当难得且特出。

概而言之，钱锺书先生既是文人，也是专业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的文人，他讲趣味，重性灵，长于创作，精于品鉴，令人心仪。作为以书为友的书斋型专业知识分子，他以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为己任，学贯中西，兼涉文史，予后学以良深启示。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西潮激荡下的钱锺书与传统文学研究。自首部“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面世以来，已历沧桑百年。在中西文学百多年来的碰撞、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于效仿中求创新，于探索中显个性，创作出大量经典之作。诺贝尔文学奖在新世纪先后授予高行健、莫言，其实是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迟到的表彰。与此形成对照，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家、文艺评论家虽然也有经典之作传世，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学者与著述，却较为罕见。因此，深入探讨“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名家的文艺思想及学术建树，更全面地认识其价值与贡献，并为催生影响世界的中国现代文论体系提供借鉴，便成了新世纪的重要文学研究使命。本书试图概括而系统地解析钱锺书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对西方文学以及西方文艺思想的引介与反思，重点探讨钱锺书建基于深厚的中西学修养与圆通的中西文化观之上的对待西方文学的开放立场（“打通”论、“比较文学”论），以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印证的方法论自觉（平行分析、双向阐发），及对西方文学观念（宗教诗学观、悲剧论、隐喻论等）和研究方法（解释学、体系化、科学化）的阐发、“归化”与质疑，兼涉王国维、朱光潜等现代文论名家的相关文艺思想。

钱锺书在引入西方文艺思想时有三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归化”，二是总结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特点，三是挑战西学范式。例如，他在阐发

法国神甫白瑞蒙的以“诵诗”与“祈祷”相通为着眼点之一的宗教诗学观时，以“贵文外有独绝之旨，诗中蕴难传之妙，由声音以求空际之韵，甘回之味”，概括白氏诗论所涵盖的西方“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思想，显然带有“归化”外来理论的意味，它更能体现阐释者对外来理论的主观理解和内在把握，也更便于本国人对外来理论的接受和认同。他的“人化文评”说则是在中西文学对话的背景下，揭示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特点。所谓“人化文评”，指的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钱锺书从西洋文评里找出了若干带有“人化”色彩的代表性例子，并把它们分为三类，而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作了由浅入深的逐类辨析，以指明西方文评中带有“人化”色彩的术语或命题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往往似是而非、貌同心异。他对人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体系化、科学化趋势的反思，则是对“西学东渐”以来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西学范式的挑战。

本书的思考并非套用以西方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发展原动力、并以从落后走向进步为衡量标准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亦非套用以西方的现代化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终极目标的“传统—近代”（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模式。美国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认为，这两种模式是“西方中心观”的体现。他希望建构起以“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为导向、“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本书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在百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大趋势中以我为主的主动对话者（有别于抗拒者与被动接纳者）的思考和探索。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	1
第一章 西潮的冲击与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	1
一、西潮冲击下的中国学术	1
二、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钱锺书	12
第二章 钱锺书的中西学修养	25
一、国学的熏陶与西学的吸纳	26
二、知识与性灵	40
第三章 钱锺书的中西文化观与“比较文学”论	51
一、超越本土情结的中西文化观	53
二、从“打通”论到“比较文学”论	65
第四章 钱锺书的古典文学研究新思维	83
一、古典文学研究与中西比较	85
二、“博证”之法与中西互证	100
第五章 钱锺书与中西悲剧之争	109
一、西方悲剧观念的引入及其百年回响	110
二、钱锺书的悲剧观	128

三、钱锺书对王国维悲剧论之反思	136
第六章 钱锺书与中西解释学对话	150
一、西方“阐释循环”论述要	153
二、作为钱锺书“阐释循环”论前提的语境论	167
三、文本释义的“循环性”：狄尔泰与戴震的对话	172
四、“阐释循环”与“意义理论”	179
五、钱锺书“阐释循环”论的得失问题	182
第七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锺书的反“体系”论	187
一、“西学东渐”与文学研究的“体系化”	188
二、钱锺书的反“体系”论	197
三、钱著体例与“片段思想”的价值	206
四、诗话的复兴：一种反思之维	215
第八章 钱锺书对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反思	219
一、“过去的现在性”	220
二、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及其限度	225
三、隐喻思维与科玄之争	231
四、“维持难以维持的张力”	238
参考书目	240
一、钱锺书著作	240
二、“钱学”文献	240
三、相关书目	242
附录一 “钱学”述略	247
一、“钱学”简史	247
二、欧美“钱学”述要	251
三、钱锺书研究与“背负十字架的思考”	255

附录二 钱锺书英文论文选译	261
一、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	261
二、还乡	270
修订说明	281

第一章 西潮的冲击与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

一、西潮冲击下的中国学术

19 世纪末，传统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步履蹒跚地走上了现代化之途。历经百年沧桑之后，中国社会至今仍然处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因此，诸如“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等命题对于关注本民族命运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始终是具有切身性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纯理论思考中的抽象范畴，更非可供把玩的时髦话题。

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在其名著《西潮》中的一段回顾之言，最足表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或“现代化”命题的切身之感：

半世纪以前（指 19 世纪末——笔者按），这些轮船曾经把自来火、时辰钟、洋油灯、玩具，以及其他实用和巧妙的外国货带到中国。我童年时在安宁的乡村里就曾经玩过这些洋货。我们天真而不自觉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艺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使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同时也经历了相伴而生的苦难、扰攘、危险以及

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失。^①

不难看到，蒋先生对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进程的体认，一方面交织着其童年记忆，另一面也融合着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人文忧思。通过他的表述，我们可以相当感性地体察到近代中国变迁的几个重要方面：西潮的冲击，“步上现代化之途”，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等。显然，对蒋先生而言，“现代化”乃是传统中国被迫跨出的一个历史性步骤，其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是“相伴而生”的。至于说“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之一是“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失”，则无疑是对乡村生活的怀旧意识在作祟。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对此类心理作过考察，他指出：“在对现在或不远过去的憎恨中，包含着将过去彻底神话的危险倾向。”^②他举例说，“只要你对欧洲的农村建筑作过很好研究，你就会发现，试图回归到小茅屋时代的企图，完全是一种空想。”^③从《西潮》一书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蒋先生对西潮冲击下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他对“现在或不远过去”并无憎恨之情，但他在表现自己对现代化进程的忧虑时，确有将“过去”加以“神话”的倾向。事实上，在那些对传统社会或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中，这种倾向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往极端了发展，便会演变成以“反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④

笔者以为，尽管传统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是外力逼迫的结果，但

① 蒋梦麟：《西潮》，227～22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② 见拙译：《空间，权利和知识——福柯谈话录》，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8年第3期。

③ 见拙译：《空间，权利和知识——福柯谈话录》，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8年第3期。

④ 参见[美]艾恺（Guy Alitto）：《文化守成主义论·序》，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

它确实因此迎来了有可能导致质变的发展契机。无论人们或基于“文化守成主义”理念抵触“现代化”进程，或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理念批判“现代化叙事”，均无法抹杀中国社会已在“现代化”的路途上越走越远这一历史事实，也无法抹杀传统中国因“现代化”进程而焕发的生机和希望。因此，笔者无意加入“现代化”是否是传统社会的必然发展途径的探讨，而更倾心于思考中国社会如何合理地实现“现代化”以及传统文化（含传统学术）如何合理地实现现代转型。^①作为人文领域的研究者，笔者自然对自身领域所发生的现代变革尤为关注，因而便格外倾向于从中国人文学术（含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这一视角切入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而在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论域内，王瑶先生所构想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便于理解该课题的理论前提，不妨回顾一下先生本人的有关论述：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

① 严格说来，“现代化”与“现代转型”这两个命题是有区别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命题，它可以用来泛指由过去进入现在所发生的变化；“现代化”则有着明确的特指，它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工业化”，因此，它更适用于描述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现代变革。有学者因而将中西方传统社会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与“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如人文学术的变革）区分为“现代化题域”与“现代主义题域”中的不同方面的问题。（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一章第一节，1～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因此，文化与学术层面所经历的“现代转型”在严格的意义上似不完全适宜用“现代化”来描述，但由于文化与学术层面所经历的现代转型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如均以“理性化”或“合理化”为标的），因此，以“现代化”或“现代化进程”来描述文化与学术层面之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

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锺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①

王瑶于十余年前所作的这番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大势的论述，至今仍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性。倘若仅就“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而论，则王瑶上述高屋建瓴的论述至少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首先，肯定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一个基本发展趋势即是“现代化”；其次，点明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与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密切关系，如他先提纲挈领地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鲁迅、钱锺书等文史专家定位为“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继而判定他们之所以能有超越前人的学术造诣，基本原因之一即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最后，简要概括了具有现代色彩的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对“文学”的界定更

① 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小引》，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